

荒 年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贫穷的家庭，父辈兄弟四人都是目不识丁的庄稼汉。不知是哪位“秀才”给起的名字，四人合起来就是“荣华富贵”四个字。多么美好的祝福！但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莫大的嘲讽！

我的母亲，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村妇女，勤劳、简朴、克己善良，虽信天命，却不求神拜佛。尽管年年希望能改变现状，但总是使她失望。

记得有一年，我家终于还清了一笔陈年老债，母亲如释重负，感慨地说：“这笔债还是你爷爷为接我到你家当童养媳时借的，压了我大半辈子，总算还清了，咱家还是有望呵……”

处逆境而不懊丧，受挫折而不灰心，第一个影响我的就是我的母亲！

1925年，我已满9岁，最大的渴望是进私塾读书，但这却使母亲感到为难。她安慰我说：“你已10岁（按传统说法），今年上学，人说是实十，粮年窝，不吉利，会一辈子粘粘糊糊的。今

年就算了 明年再说吧。’在我的家乡是有这种说法的 但我知道她并不相信这些 即使信也是‘敬神如神在’。

我的家乡位于关中平原，毗邻古都咸阳、长安，古迹文物随处可见，传说故事源远流长。这里民风朴实，豪爽尚武，骚士墨客代不乏人，民间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我在拾柴割草之余 就去听“古经”和“编闲传”。在众多的地方戏中，我最喜欢秦腔和灯影，题材不外乎忠臣孝子、绿林好汉、才子佳人和神话故事。我常挤进人群中默默地记下台词，模糊中知道中国很大，有很多朝代，有讲不完的故事，意识到在纷纭的人物中有着好与坏，激起我爱和憎的共鸣，同大人们一起高兴和叹息！幼小的心灵里充满着对忠臣孝子的敬佩和对英雄好汉的向往，憧憬着换一个好的朝代，这也许就是我受启蒙教育的开始，当然是封建的、世俗的。在知道“天下”和“九州”后，我最大的愿望是要知道“天下事”，是要和有些孩子一样能上学读书，一种不可名状的求知欲，在我的胸中冲腾！

希望终于实现了！1926年，我堂堂正正地走进本村私塾的大门，成为名符其实的“念书娃”。私塾设在村东的九霄娘娘庙内，这时已改为学校。看来民国的新风，经过了十多年，终于吹进这穷乡僻壤。学校的老师是一位前清秀才，背着潮流，依然故我，照教四书五经，“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画像仍然端挂在墙上。这一年的11月，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五原南下，把围困西安城达八个月之久的河南军阀的“镇嵩军”逐出了潼关。形势突变，孔夫子像被冯玉祥像取而代之，这使村里的遗老遗少们常聚在庙里谈论时局，大发“人心不古，世态炎凉”的牢骚。

1927年一开春，秀才先生也如同孔子像一样被从省城洋学堂毕业的学生所代替，九霄娘娘庙焕然一新，除更新课本之外还添了体育、音乐等新课程。孩子们很快就会唱国民革命军进

行曲、苏武牧羊、放足歌。直到现在 我仍偏爱“苏武牧羊”这支歌，歌词发人深醒，给人以热爱祖国坚贞不屈的力量，曲调悲凉慷慨 余韵铿锵不绝。这一年也使我懂得了“祖国”一词的概念，语文书的第四册第一课使我深为感动，寥寥数语，我反复地一句一句地咀嚼，使每一个字都铭刻在心，至今我还能一字不误地背诵。其文曰：

“中华 我国之名也 自我远祖以来 居于斯 食于斯 岂可不爱我国耶！”

1928年，我的家乡礼泉县有了共产党，闹起了农民运动。穷苦人纷纷参加要求减免田赋、取消苛捐杂税的“交农”运动。成千上万的农民扛着农具，包围了县城，如火如荼，但在围城数日后，惨遭镇压。不少人在这次斗争中光荣牺牲，其中有县委书记邱步月和我的老师李培芝先生的弟弟李岐山。

农运的失败 再加上久旱不雨 历史上有名的“关中大旱”的帷幕正徐徐拉开。1929年下学期，因灾荒已成定局，学校宣告停办。

过去的三年多，我像一头饥渴的笨牛，撞入知识的草地，日以继夜地吞食，不停地咀嚼，胃口也越来越大。我好像到了一个新世界，有多少新的事物，等待着我去认识。出出进进九霄娘娘庙的三年多，不仅使我闻到了社会的芬芳，也嗅到了从社会的污泥浊水中散发出的臭味。这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求知的烈火在胸中越烧越旺；新与旧的激烈斗争，时局的急剧变化，我的视野逐渐开阔；我不仅能读懂小说，也阅读共产党的传单和小册子。

偏偏就在这时辍学，顿觉天昏地暗，茫然不知所措。

持续三年干旱 又加上蝗虫肆虐 灾区赤地千里 十室九空，饿殍载道，鸡犬无踪。以我村为例，一个四十余户的村庄，包括

我四叔父立贵一家在内有七家成了绝户。当时有人上书政府陈述灾情说：“此种惨事 实近三百年来仅有也！”

黄尘蔽野！雾海茫茫！何处是归宿？我不相信命运，决然离乡背井 出外谋生 挣扎着前进。

1930年夏，大哥介绍我到渭河南岸的一家中药铺当学徒。主人既行医又卖药，我是他惟一的助手，什么活都干，换来的仅是一日三餐。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吸足了鸦片烟，精神抖擞，按惯例要吃点东西。但祸从天降，我在厨房里给他烤的烧饼却不见了。是被狗还是猫叼走了，我也说不清。他怒火冲天，大声嚎叫：“该死的 你给我滚！”第二天一早 我的铺盖被扔到门外 如弃敝屣 我只能含泪而去。

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巧遇姐夫，他把我带回家。这已是1931年初春。当时家里只有母亲和两个弟弟，一日两顿稀饭充饥，就这样也难以继。母亲便让我去找在距家一百里开外的淳化县以北的某村做短工的父亲：一则希望找个地方糊口；二则希能从父亲那里背几十斤粮食回来。不料我离家四天，到处打听也没有找到父亲。所幸的是，我虽身无一文，但多遇善人，使我得以安然回家。第一天，我从早走到天黑，途经昭陵以西的东庄村。当我走进村头一家破落的院子，一位老太婆手拄拐杖，站在一眼土窑洞的门口。她看我的穿着虽旧，但还不褴褛，腰里缠着一个炒面袋，手持打狗棍，一看就知道是山下下来的要饭娃。我乞求她能允许我在堆柴草的窑洞住一宿，老人不假思索就让我进入她的窑洞。真是碰上了活菩萨。晚上，老人还盛了一碗稀饭给我暖腹。第二天我继续北上，到旬邑县的土桥镇，下午到达目的地——淳化县属的通神沟村。我逢人便打听我的父亲何在？其中有位老汉看我心急如焚的样子，捋着胡须想了想，指着一处窑洞说：小孩，那里住了一家从礼泉来的人家，或许他可能知道

你父亲的下落。于是，我便找到那户人家。那人果然是位邻村的人，逃荒在此。但使我大失所望，他的回答是不知道。而且，我看得出，他深怕我要求留下住宿，因为已是黄昏时刻。这位乡亲不愿和我多说，便回窑洞拿出一块杂面饼递给我，并说：“去吧！到别处去打听吧！”说着便掩上窑洞的门，就这样把我拒之门外。我心想这位老乡也太不仗义了。

通神沟村子临一条深沟，人们在沟的上半部凿洞而居。天色将晚该到何处投宿？我看到半沟里有一座小庙，便向小庙走去，看能不能过一宿。当我快要到小庙时，有人从沟底赶了一群羊上来，没等我开口，这人便说：“小兄弟，这庙没有门，不能过宿，夜里常有狼出没，前几天有人还碰到过。走，跟我上去吧！”我随牧羊人来到一家大的院落，靠岩一排窑洞，临沟有院墙围着。牧羊人一边把羊群赶进一眼大的窑洞，一边指着旁边一眼存放饲草的窑洞说，你晚上可在那里过一宿。我没有说别的，就向牧羊人深深地鞠了个躬。在院落另一头的几眼窑是一所村学，学生已放学回家，有两位教师正对院内一块约一米高的碌碡在议论什么。我走近他们本想要一碗水喝，看他们谈兴正浓，就没有开口，只听他们说：碌润而雨，这预示着天将要下雨。他们又看见我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好像对他们所谈的感兴趣。他们其中的一位看了我一眼说：小孩，你念过书吗？我说，念过。他说，好！你在地上写个周字给我看。我随即用打狗棍在地上熟练地写了个周字。两人看了又高兴又惋惜，并问了问关中灾区的情况。

天黑了，我走进草窑洞，原来里面堆的是铡碎的麦秸，太好了，有铺有盖，可以好好睡上一夜。我正在想，真是吉人天相，忽听洞外传来脚步声。接着两个学生走进洞来，一人打着一个灯笼，一人双手端着盛饭菜的盘子放在我的面前说，这是他老师要

送给我吃的。老师还说，吃不完你就留下。学生还特意说，老师今晚的饭只吃了一少半，多一半留给你吃。说时，两位学生喜形于色，显然，对我表示善意和同情，对他们的老师给予我的关照感到高兴。

这一顿晚餐，可以说是我被赶出那个小中药铺几个月来吃的最好的一次饭，睡的也好，想的也很多：今天是我离家的第三天，父亲连个踪影也打听不到。我决定明日回家。

一早起来，我离开通神沟，没有走回头路，而是先到淳化县城，然后沿清水河谷穿过嵯峨山，黄昏时到达清水河流向关中平原的出山口——口子头镇。我本想在这里找个地方过宿，却闻山头城堡枪声时断时续，行人慌慌张张，就继续向回家的西南方向走了约十余里，来到一处土原上，此处连个村子也没有，忽见路旁有几棵树的地方有人出没，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四方形的坑院，内有四眼窑洞，边角有个过道可以上下。天已暮色苍茫，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扣当地叫地窑的这户人家的门，心想，如果主人不行方便，也要赖着在他家的过道里蹲一宿。当我敲开门时，出来的是一位看上去十分憨厚的人，嘴边有个豁口，说话有点漏气。一见面我就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当然，他不可能认识我。这人看我的样子，不用问，就知道是来借宿的。他把我带进他住的窑洞，我主动说，我带的还有炒面，只要一碗水就行。这人却说，我已煮好菜稀饭，我们一起吃吧。这时他才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当他知道我是礼泉县东乡西张堡村人时，他打断我的话说：你们那一带我去过，前几年我作为麦客每年到你们那儿赶场。他这一说，我就肯定他在我家割过麦，我称他豁子叔叔。

吃完饭，我和豁子叔叔躺在炕上。我谈起有一年他到我家割麦子的事，他感到惊奇，并自言自语地说，这能是真的吗？不过我嘴上的缺口只要见一面，谁也能记得住我。

我们继续谈。当我谈到在我家割麦子的那天，晚饭是我送到打麦场上，他和我的父亲一起吃的。饭后他要去村前的菩萨庙过宿，我父亲留他在打麦场临时搭的草棚里过宿，他欣然同意，因庙里是砖地，草棚是为看守麦子自家用的。我还告诉豁子叔叔那天晚上他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给我听：他说他们赶场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晚上一般都在村庙里过夜。他听有人讲，有一年一个麦客在某地某户割麦，那户人家亏待了麦客，这位麦客十分气愤，就点了一把火，烧了这户人的麦场，并在地上用木棍写了一首打油诗：“人家收麦你收灰，人家待客你亏客。若问此事那个干，出了你门端向北。”听到这里，豁子叔叔禁不住哈哈大笑，掐了我一把说：小家伙，有趣吗？

豁子叔叔对他讲的故事评论说：我绝对不相信有那样的事，即使有人亏待麦客，只不过是吃喝不好，也不会干出那样伤天害理的事。这只是一个笑话罢了。

这一夜我睡的很好。第二天天已大亮，豁子叔叔把我叫醒，说要吃早饭了。我说：离家还有百里之遥，要赶路，否则今天回不到家。他看我决意不肯用饭，就送我上路，相互挥手告别。

离家的第四天，我赶了一天路，又是一个黄昏，当我走进村门，一喜一忧。喜的是走了几百里路，又回到家。俗语说：“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忧的是没有找到父亲，家里如何度日？诮料当我一进家门，第一个看到我的就是父亲。他又惊又喜，大声说，我回来后，你妈知道你没有找到我……说着母亲从屋里走了出来，喜得落下泪来，真是皆大欢喜。

不久，大哥又介绍我到一家叫祥盛源的油房给厨师当帮手，这里有几十名雇工。晚上，我常去榨房或长工屋“编闲传”，说古经。工头知道后，恶狠狠地骂道：“没读过孔孟的书，还装腔作势学圣人。”我吃了一肚子闷气，就把一首在章回小说中看到的

诗用粉笔写在磨房的墙上：“龙戏千江水 虎登万里山 君子不逢时 小人下眼观。”这次我算是咎由自取 又干不成了。

1932年 刚过春节 大哥再次托人介绍我到咸阳县城内“积善堂”中药房当学徒 那时叫“学生意”。这家药房有三间门面，是一家大字号。老板是县商会的副会长。亲友们都为我能进入“积善堂”学生意感到高兴 叮嘱我要好好干 否则 也对不起“荐官”（介绍人）当介绍人把我带到掌柜面前时 掌柜让人拿来纸笔，要我写几个字给他看。我按哥哥事先教我的，就写了“一本万利”四个大字。他和在场的人都喜形于色，点头称是。他叫了一声“符相”（那时大字号把学徒叫相公 简称相）并嘱咐了几句。这时，我同荐官的心就像一块石头落了地。

整整一年中，我一面循规蹈矩努力干活，一面利用余暇偷偷自学，准备继续上学，不觉到了年终。一天晚上，一位从乡下来的中医大夫躺在大烟灯下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看你志不在此。”我不假思索地引用一本“尺牍”上的话回答说：“非为贪图风景 实言糊口计耳。”不料 这话传到了老板耳里。过了春节 当我请假省亲时，他故作和颜悦色地问我，你还回来吗？我虽有些尴尬，但还是鼓起勇气说，如果条件允许，我想继续读书。老板没说什么，只是微微点了下头，究竟是赞成还是有别的想法，谁也猜不透。就这样，我离开了积善堂。

1933年初 我终于又走进了九霄娘娘庙 并于1934年夏天考入县立仓房巷小学五年级。“仓小”是荒灾后全县仅存的一所六年制小学。

童年已在坎坷不平满布荆棘的道路上悄然逝去。现在才来补学童年未完成的课程，这会使人难堪，但对我来说，就像无价之宝失而复得，心中无比兴奋。我向往着新的世界，希望能进更高的学堂，以抢回我支离破碎的童年失去的时间。

童年毕竟成了终生的追忆。每个人都有童年，都会忆起童年，这也许是人生中忆得最多的一个时期。

我有不幸的童年，那就是失学、辍学，是终生的遗憾。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拼命地追赶，或可补其一二。不管处于什么环境，都不敢有丝毫懈怠，但逝去的毕竟逝去了。我也有幸福的童年，那就是能够进学堂。尽管是那样迟、那样支离、那样短暂，但当我想起过去，却总是融融在心，幸福和艰辛，回味无穷。我也为我在童年时得到一件珍宝而骄傲——那就是在逆境中，对自己的目标追求的那种坚定顽强、矢志不移、锲而不舍的精神。在任何时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这种精神都是不可缺少的。它的确使我成长，使我走向光明，走向祖国的自由和胜利！

(1987 年 1 月 7 日)

抢回失去的童年

我曾在《童年的回忆》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也为我在童年时期得到一件珍宝而感到骄傲——那就是在逆境中矢志不移；坚定、顽强、锲而不舍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时候，任何情况下，这种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也的确使我终身受益。

1928年下半年到1933年，四年多的颠沛流离生活，不仅没有改变我要继续进学校读书的初志，而且坎坷困苦的磨炼使我更思奋进，求知的烈火在我的胸中更加炽热旺盛。

辞别积善堂

1933年秋，家乡收成不错，连年的旱灾、虫灾、鼠疫造成的大灾害宣告结束。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位郎中先生躺在大烟灯下，吸足了鸦片，呷了一口我为他泡的浓茶，发现我在翻阅一本小学高年级的算术课本，便若有所思地对我说：“论学生意，积善堂是个大字号。不过嘛，依我看，你志不在此。”

这话使我感到突然，我随即不假思索地用在一本《尺牘》上读到的一句话脱口而出：“非为贪图风景，实言糊口计耳。”

不料，这句话传到药铺老板段五峰的耳里。段五峰时任咸阳县商会的副会长。

1934年旧历正月十五过后，回家过年的先生们和老资格的伙计们陆续回到店里，该轮到我才进店一年的学徒工回家探亲了。其实我已下定决心，辞退工作，回家继续学习，不知是不好意思还是留有余地，仍拟以回家探亲的名义离开。按照店里的规矩，我把回家带的小包袱放在柜台上，当着店里同仁的面打开，一层一层翻开几件旧衣物，然后再包裹好。恰在这时，段掌柜从柜房里走了出来，我即赶前向其鞠躬问安同时放下包袱，立在一旁，听候他的吩咐。我在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因为段掌柜平时很少来店里，大部分时间是在县商会里混，以绅士自居。

段掌柜一本正经地但却和颜悦色地打量着我，并关心地问道：“符相，听说你要回家上学，这是真的吗？”我硬着头皮说：“是的，如果有条件的话。”老板再没说什么，只是点头微笑，但我却嗅到几分酸味。

老板随即把目光转移到挂在柜台外面右侧墙上的一幅对联上，众人也随着他的线把目光集中到对联上。对联是当地一位名流书写的，字体伸展流畅，其文曰：“越国大夫曾贸易，孔门弟子亦生涯。”接着，大家又随着老板的视线把目光转移到左侧墙上与右侧相对称的另一幅对联上：“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两幅对联陪伴着我度过春夏秋冬，对联的书法、情趣以及它的历史故事的内涵使我受到积极的启迪。可今天段掌柜的这一动作，究竟是自鸣风雅，还是教训别人，令人莫名其妙。

辞别积善堂，我走进一家杂货铺，用一年辛劳换来的四元“赏金”买了一张芦苇编织的席子。我想母亲一定会高兴的，因为她土炕上铺的席子早已破烂不堪。我又考虑到回家行程五十余里路，一张大席子不好扛，随后又买了一个竹制的大背篓盛着。也是一举两得，这种背篓，庄稼人割草拾柴是少不了的。

我背着背篓，反觉得一身轻，出县城北门，登上咸阳古原。周秦汉唐古塚，星罗棋布。北望昭陵（九峻山主峰即唐太宗陵墓）隐约可见，回首渭川，烟树茫茫。几年来，多少辛酸，但愿伴随着泱泱渭水东逝！

九霄娘娘庙

我一回到家，先向母亲和两个哥哥禀明我已辞退积善堂的工作，要求继续上学。母亲看我的决心很大，便欣然应允并鼓励说：“有志者，事竟成。”我的两个哥哥完全支持母亲的决断，表示再困难也要供我读书。

家庭这一关顺利通过了，这虽是我意料中的事，但仍使我深感振奋。

这一年，我已十八岁，理所当然地应像大哥、二哥一样外出谋生挣钱，为家分忧，可我还要他们供我上学。加之，我的小弟忠凯年已及学龄，由于我的缘故，这一年他未能入学。另一个弟弟忠康，由于同样的原因和荒年的耽误，一天也没有上过学。社会上，对我这个家穷而年龄大，却要和鼻涕娃娃们一起走进娘娘庙的“念书娃”议论纷纷。有人说，如果家境宽裕些，虽已成年，多念一点书，总是好的，但某某家境贫寒，父辈四人都是目不识丁的庄稼汉，如今，太阳还会从西方升起吗？真是鬼迷了心

窍。当然，也有人同情、支持和鼓励。左邻右舍的乡亲们中不仅有相怜者，而且还有一些头面人物，特别是邻村曾在省城读过中学、参加过 1927 年本地农民暴动的几位前辈，他们或当面鼓励或托人转告，要我挺起胸来，准备报考荒年后全县仅余的一所完全小学——县立仓房巷小学五年级，并说如果经济上有困难，他们可以帮助。无疑，这对我是有力的鼓舞和安慰，也是对那些闲言碎语的间接批评。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从窘境中解脱出来，又使我顶住了在当时连我自己也认为是合情合理的非议？我以为是受尽折磨的童年，以及近年来涉足社会、含辛茹苦使我比以往更加明白的一个道理：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不掌握一技之长，很难说是一个自立的人，更谈不上为国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就是我锲而不舍地一有机会就要上学读书的动力。我还尊崇“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古训，厌恶世俗的“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说教，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人穷志不穷”。

我怀着喜悦和怀旧的心情来到阔别四年的九霄娘娘庙。山门外路旁的两只铁狮子依然如故，只是它们的头顶被人们抚摸得更加光亮。裂着嘴，好像对我说，好久不见了，欢迎你回来。

娘娘庙前后两个殿堂紧紧地连在一起，为燕、齐、曾、李、梁、符六大姓也就是六个自然村共有。人们一般称之为“六社庙”或“大庙”。至于从什么时候把村学设在这里，无从考查。我只知道门前的那口大钟，其铭文清楚地记载是明朝万历年间铸造的。

走进校门，便是大庙的两座殿堂。墙壁被粉刷得焕然一新，前殿东墙上挂着一幅新的孙中山肖像。肖像西边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两边墙上原来的壁画和题字却消失了，不知是早已剥落还是被这次粉刷掉了，这使我感到十分遗憾！

壁画上部书写的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一文，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此刻，我仿佛又回到童年时的春天，反复背诵文中的两句：“况阳春召我以烟景 大块假我以文章。”现在读来 更觉声音铿锵 韵味无穷。

村学的老师仍是四年前我辍学时的李培芝先生。李先生在省城上过中学，在我的家乡是辛亥革命以来第一代知识分子，是位新派人物。他把我和比我年龄还大两岁的乔德轩同学叫到他的跟前说：“我为你们有机会学习 并准备考高小（那时把小学五六年级叫高等小学）感到高兴。总的要求是把重心放在语文和数学上，目标是力争考上高小。具体计划是复习小学四年级的课程 选读《古文观止》和唐诗里的著名篇章 演练数学四则中的一些难解题例，每周写一篇作文，每天要记日记……”

李先生并言明，我和德轩由他单独授课，时间由我们自己掌握。他说 我相信你们懂得：“一寸光阴一寸金。”

我和德轩同窗共读 我们的座右铭是：“两耳不闻短和长，一心备课考高小。”到了暑期，我们又联袂到县城仓房巷小学报考。很幸运，我们终于如愿以偿。

前几年 我回到家乡 与德轩兄谈起当年往事 犹历历在目。回京后，写了一首诗相赠：

寄 德 轩 兄

忆昔荒年后，寒窗就读时。
野庙残垣内，诗书共释疑。
从来怀旧日，感慨常系之。
纷纷复扰扰，往事如云织。
门礲白玉石，御池八棱碑。

神钟六社史，惜被愚夫欺。
北地烟尘起，南天倾柱基。
霞光驱白雾，碧血染红旗。
江河流万古，明月照雍岐。
秦关一百二，不锁远人思。

仓房巷小学

这一年的暑期，我以第四名的总成绩考入仓小五年级。我的老师和乡亲们都为我能考上设在县城里的这所高等小学而感到高兴，特别是我的母亲，看到她的操劳没有白费，十分欣慰。

开学后，我发现年龄比我还大、个子比我更高的同学除乔德轩外，还有几位坐在我的后排，真是“吾道不孤”。这种荒年带来的怪现象，多怪也就不怪了。

新的学校、新的学年、新的同学和老师等等，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开学伊始就碰到赶走校长的风潮，这也许是我上的第一堂课——社会课。起初，晕头转脑，感到茫然。但还是跟着老同学上街游行，到县政府请愿。后来，我才逐渐明白，斗争是很复杂的，其内在的矛盾从表面现象看是很难了解的。换个新校长不仅反映了教职员间的派别斗争，更实质的是进步和保守势力的较量，以及党、国民党与政各方趁机推波助澜，以壮大自己力量的结果。

学潮在县党政各方的干预下很快得到解决。对我来讲，新旧校长，孰优孰劣无关紧要，也无法比较。幸好，学校很快恢复正常。老师们多是省城回来的中级师范和普通中学毕业的学生。给我的印象是他们谈吐不俗，着装时髦，满腹经纶。他们教

的知识都被我如饥似渴地吞食。他们对我的学习态度也备加赞扬和鼓励。当然，课堂上的学习满足不了像我这样年龄该上大学的成年人的渴求。于是，我很快发现学校图书馆是个好的去处，那里就成了我的第二个课堂。图书馆的藏书还真不少，它拥有大量的书籍和报刊。有些书刊，我连书名也没有听说过。例如鲁迅的某些小说和杂文集 蒋光慈的《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以及冰心的《去国》、《沫若诗集》、刘大杰的《支那的女儿》，还有一部《胡适文存》及古典名著《水浒传》和《红楼梦》等等。报刊不仅有本省的几大报纸和刊物，还有上海来的报纸。我虽然已是成年人，但特别喜欢上海出版的由陶行知题写报名的《新儿童报》。在仓小的两年，我把大部分的课余时间消耗在图书馆里 确实获益匪浅。

仓小的体育设施也很可观 有足球场、篮球场 还有网球场，对我都是些新的玩意儿。或许是新风才刮到这深远的内地，球场上时兴英语 如把投篮叫“休”(shoot) 长传喊“朗帕斯”(long pass) 球出界喊“噢塞”(out side) 网球场上也是一样 如打了一个好球 观看的人叫好 就喊“狗得报”(good ball)。当时，我在球场上也人云亦云，并不知道它就是几个英文字，只感到新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很少听到有人在球场上说洋文。我认为这在当时是半殖民地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

身价倍增

在仓小的两年学习快要结束了，最后一个学期——1936 年上半年，一方面准备毕业考试，另一方面理所当然地在考虑自己的前途。正在这个时候，我的大哥到学校来看我，提出两个问题同我商量。

第一个问题，大哥说，邻村某家是乡里殷实之户，托人来我们家说媒，愿将其女儿嫁给你，并说人长得挺标致，一双巧手，能做针线活。此人家不讲聘礼，但需同意三个条件：首先要保证白头偕老；其次你毕业后要在本地工作；再次是女婿顶半个儿子，他家与外部的事，要多关心和维护。大哥说得津津有味，但当他发现我既不面红耳赤也不眉开眼绽，却低沉着脸，对他的话冷若冰霜。于是，大哥又说，妈妈说终身大事由你自己定。我完全理解母亲和大哥的一片苦心，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了解我的。我现在已是一个社会的人，开始学会了独立思考；我的思想已长上了翅膀，在寻找机会，要飞出去。我也想了合乎情理的三条以回答母亲和哥哥：其一，现在谈婚姻问题还为时尚早，两个哥哥不是还没有成亲吗！其二，毕业后，继续求学还是做事，眼下尚不能定，遑论其它；其三，我对第二个条件尤其反感，难道我一辈子就不离开家乡吗？这明明是在作交易，实在可鄙。大哥见我怒气冲冲，就连忙说，人家也是看上你的人品，既然不愿意，就作罢。我们谈第二个问题：咱乡联保主任（当时乡政权实行保甲制，联保主任等于现在的乡长）找我谈，说最近省上要每个县选送两名学兵，进绥靖公署教导大队受训。条件是高小毕业生，身体健康，年龄十八至二十五岁。县上把任务分配给各联保，我们东乡几个联保主任合计，认为你去较合适；并说这是个好机会，结业后就当军官，家里还可以得到八十块大洋的补助金。我问大哥母亲的意见如何？他说还是那句老话：女大当嫁，儿大当家。你的事还是由你自己定。我遂笑着问大哥：是不是因为咱家穷，他们才看准了我？大哥说，那倒不会，他们也是一番好意。他们很称赞你的毅力和意志，终于要在高小毕业。不过他们也认为要继续上学那恐怕是很困难的。我告诉大哥，回去告诉联保主任和关心我的乡亲们，谢谢他们的关怀，我现在正在准备毕